

远行是一种与这个时代区别的决定……
远行让我知道血肉之躯的伟大和渺小
——骆英:《人为什么远行》

我是一个站在巅峰俯视人生的登顶者
我呢 因而就永远站在了我的极点
——骆英《眺望北极》

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探险意义上的“登山”历程,恐怕已无人可考了。不过按照常识,应是在大自然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的时候——就像黑格尔说的,是当“主体性”从自然中逐渐分离和确立的时候。登山此时就变成了一种“审美”的活动。然而他还说,“谈到各种自然美,古代人比现代人谈得少些”,因为他们主要是“从‘效用’的观点,把某些自然事物提出来观察和研究”。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,李白“一生爱向名山游”,除了愉悦性、放纵山水,逃离官场压抑和人世俗务,也确还有早先魏晋时期遗留下来的“游仙”情结在作怪。通俗地说,他是把登山看成对自己身心“有益”的事情——甚至可能得道成仙,所以才乐此不疲的。

而现代人的探险似乎就变成了一种“纯然的冒险”,一种“挑战自我极限”的活动。因为这不但对身体“无益”,而且还充满危险和可能的牺牲。据说世界上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的探险活动(也就是“7+2运动”)者,迄今为止不过15个人而已,而在这个危险的旅途上倒下的人,则远不止这个数字。这使人相信,人类与自然的关系,人类对于自然的审美,已经远远超过了李白和黑格尔的认知范围。“脚着谢公屐,身登青云梯,半壁见海日,空中闻天鸡”,现代探险家们登山的情景,可不是像太白梦中的情境那样轻松可爱,而是用惊险、死亡和侥幸完成的生死穿梭。

因此,读到骆英的这本《7+2登山日记》时,除了惊讶,我还有一种久久的敬慕和好奇。我感兴趣的,除了这部诗集中所记录的惊心动魄的登山历程,还有他——这个不可思议的“审美主体”的个人动机。难道只是出于对这种“少数人的运动”的热衷,抑或是对于“超强度刺激”的兴趣吗?我想类似的猜测肯定会有理由的,因为就骆英的身份背景的特殊性来说,这类猜测实属自然而然。不过,探险和寻求刺激的方式有千百种,难道非要用这样“极限”的冒险方式,而且还要用“诗歌”的文字来记录下这一过程不行?这使人相信,骆英的确是在冒险的同时又实践着他的“审美理想”,而且我甚至还认为,是这样一本期待中的诗集在冥冥中支持着他,支配着他,使他在许多难以坚持的时候坚持了下来,在无法攀登的地方完成了攀登。

理解这些诗的过程,似乎也变成了一个“模拟攀登”的过程,因为这并不容易。坐在安稳的书斋里想象冰峰绝顶的无限风光,似乎有些过于轻松浪漫,通常人们很难知道那景象背后非人的艰险和绝地的畏惧;或是用了另一种刻薄的“小人之心”,去猜测他人冒险的世俗动机与功利心思,那就不仅是变态,还有些低级了。虽然,作者在诗中所使用的是刻意随机化了的口语,有时甚至是“速记体”,但它所传达的经验却非常人在“平常心”下可以体味和感知的。因此,这部诗集对读者来说,也变成了另一意义上的一座“冰峰”,需要用心去体验其中的艰险和乐趣,体验其意念和情感,以及那种出世的危险与高度。如果不能成功“登顶”,就很难对它有一个准确的解读——而那样的话,也就意味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失败者,一个面对勇敢者的自惭形

“我终于可以远眺整个时代”

——关于骆英的诗集《7+2登山日记》

□张清华

秒的猥琐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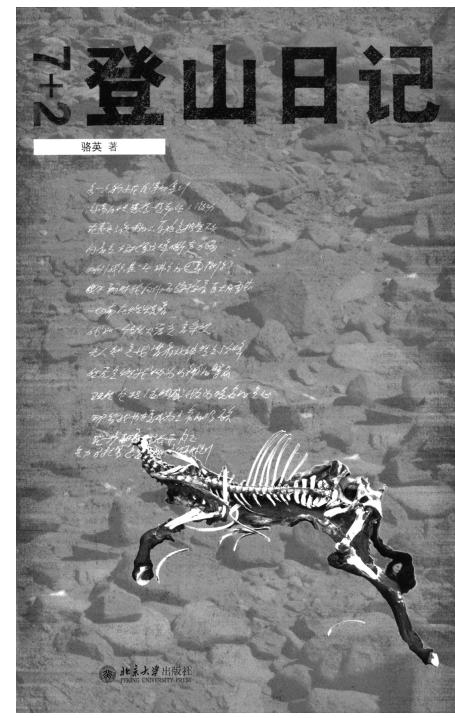
理解骆英的诗歌仍旧要从一个传统开始,这首先会让人想到一个诗与“行动”互相统一、互为见证的问题。用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话说,便是“一次性的写作”——即是“一次性的生存”的见证和结果;用海子的话说,这叫做“一次性的诗歌行动”。两种说法都强调了“文本”与诗人的“行为”之间的对应与印证关系,文本因为行动的见证与人格的践行而显得非同一般。用通用的诗学概念来表述,这应该叫做“生命本体论的诗歌观”。那什么是生命本体论的诗歌观呢?就是生命足迹与诗歌写作融为一体的诗歌观。19世纪浪漫主义者大都是这样的诗人,比如雪莱是在横渡亚得里亚海的时候死于风暴之中,拜伦则是死在希腊人为反抗土耳其统治进行战斗的沙场上,他们都用富有冒险意味的行动,甚至是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诗歌,同时也因此终成正果,完成了他们作为诗人的人格形象。

从这个角度看,《7+2登山日记》至少也是一种“不可复制”的诗歌写作,因为这其中有登山者生命的历险,有身体“在场”的证明,它无疑也是一种难于模仿的“极限性的诗歌行动”,或是一个“一次性的”“特殊的行为艺术”。因为它所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,本身就含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含义与价值。当我们阅读这些诗句的时候,我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,它们不是形而上的虚构、无中生有的观念传达,而是在同时阅读那个冰天雪地中不曾畏惧和退缩的人,阅读他在生命绝地的坚韧与诙谐、在死亡威胁中的自信与豁达,甚至透过字里行间,读者还可以嗅到他喘息的气息,触摸到他冻僵或痉挛的躯体,在极限体验中难以排解的垃圾情绪和无意识活动……从这个意义上,它是具有灵魂震撼力和生命感动力的诗歌,是令人“读其诗想见其为人”的极限性文本。

“人为什么远行?”这是我在阅读骆英诗

歌、猜测他的登山壮举时最先想到的问题。毫无疑问这里同样有一个古老的传统,远游、登临、行吟,这都是自古以来中国和世界一切诗人行走和写作的常态。登临山水不但会引发“思古幽情”,而且也会产生出真正的“哲学情境”,一切出世的情怀、跨越时空的感慨,大约都与身体力行中的“登高”或者“远行”有关。人为什么远行——在这场绝地的旅行中诗人发出了这样的追问,我想他确乎是在自问,是在对世界的极限式探寻、对生命的极限式挑战、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叩问中,寻求确切的答案。

在关于阿空加瓜峰部分的诗章中,有一节《远眺我们的时代》让我找到了答案。它似乎让我明白了,每日高居于“中坤大厦”顶端办公桌前的骆英,为什么要爬遍世界的极地高峰,他要了解什么,他对这世界和时代究竟有什么疑虑和困惑。这些看似可以从理论上找到答案的问题,在他这里却需要通过真正拉开距离的观察、追索和眺望来求解。远游对他而言就是“与这时代拉开距离”,就是“与世界相对立”的态度,这同《红楼梦》中曹雪芹所表达的想法其实是不谋而合的,当他以“不知几世几劫”的长度和眼光去看这世界的时候,所获得的答案也是一片雪地般“白茫茫”的景致,只是那多半属于一个“破败”意念的幻觉。而骆英,则是要实实在在地站在“异国的



高山上”,真切地望见远景中的我们这个时代,“其实它白茫茫的什么也没有”:

它既美丽迷人让人留恋
又丑不堪言让人痛恨
它既无比繁荣地进入后人类时代
又无比残酷地你争我夺
它以哲学的明辨和经济学的公正表明现代性
又以文明的谋杀及全球化的推断伤害的孩子
时代啊 你让我无比幸福又无比痛苦
无比明智又无比糊涂
在这遍布荒石的黄昏之夜
我为我的贪婪而深深恐惧

这似乎是一节姗姗来迟的“诗眼”,它表明骆英花了如此繁杂的篇幅,来描述这场旅程中纷乱而恍惚的经历,展现动荡和异彩的世界,其目的与登山一样,最终获得的是一个“远眺的整体”,它会完成对于细节的超越和遗忘,而生成对时代和世界的“整体性”判断。

这多像是李白的“忽魂悸以魄动,恍惊起而长嗟。惟觉时之枕席,失向来之烟霞”。这场远行让他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,来思考世界、现实、时代和自我,一切真实与幻觉,远景与近景,一切关于生命与死亡,物质与信念的命题。

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出,在这登山背后,隐含着诸如全球化、中国崛起、资本力量的蔓延等问题,隐含着一个中国人寻找其民族自信与精神自尊的心路历程……这一切都透露着,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迅猛膨胀的时代,一个置身其间诗人,他的灵魂困惑与自我认知。所以,他要以高出尘世喧嚣的高度,来确立其精神和价值的地标。

但假如只是出于这个整体性认知的动机,恐怕还不能支持着一个生命去跋山涉水,经历万千艰险。正如他在《要出发啦》中不经意表露的,“我希望借冰雪洗净苦难的记忆/我希望

在极点能搞清财富的意义”,能够激励他去攀登、去挑战这些近乎无法企及的生命禁地的,恐怕还是那些奇妙的微观体验,以及他堪称五味俱全的内心秘境。在这里,骆英张开了世界和生命的褶皱,他的那些美好的或恐怖的记忆,那些雄伟壮丽的或荒凉难堪的视觉,那些目睹成功、失败、死亡、放弃的,或兴奋或沮丧的经历,甚至是那些散布在圣洁之地让他时时纠结和惦记的垃圾与粪便……这些混合的五味杂陈的经历,使他真切地体味着生命与世界的博大与脆弱、美丽与虚幻。

从这个角度我又宁愿相信,诗人只是纯然地借这样一种极限式的方式,来扩展他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,来更深入地理解和探查生命与人性的各种极限的可能。这里有生死一瞬间的转换(《山上的滑坠》《生不如死》),有亲眼目睹擦肩而过的死亡景象(《关于死去的俄罗斯人》《雪景与死亡》),有登山者对自己信仰和信念的执迷与彻悟(《念经日》《想和骂》),有关于财富与幻灭的繁杂较量与纠结(《关于注意事项》《前台的巴蒂莎》《不高兴的山友》),有对人间真爱的思虑与确认(《0086的幸福感》《关于蕾拉的记忆》),有关于人性善恶的观察与辨别(《偷酒的中国女人》),可以说,登山者是在借这个过程,去精细而深长地探究生命的奥义,咂摸人世的诸般滋味,同时也对自己的内心和灵魂进行反照和解剖。

这是出人意外且非常迷人的处理。骆英并未因为有登山的壮举,就把自我单面地描绘为一个天地间的圣徒和英雄,而是以常人之心,“全方位”地袒露了自己各种经历、心理及无意识活动。这恰好真正张开了这部诗集的经验空间和生命意境,使之展开了世界与生命、物质与精神、人性与意志、欲望与信念等各种命题的复杂性。在《想和骂》中,骆英用故作调侃的句子写出了他内心的纠结:

轮到骂自己的时候
往往是在登顶前夜
那时 你在怀里捂着自己的袜子
骂着自己是天下第一等傻蛋
心中就涌起起身下撤的冲动
然而 在山下回望顶峰之际
你会为自己的坚定而感动落泪

在这些诗句中,骆英不忘把自己写成一个时时流露着人性弱点的常态式角色。正是这样一种定位,使他不只是一个遗世独立的、仅与自然对话的诗人,而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返身与人间世界对话、与世俗的一切景象对话的诗人。而惟其如此,他才更加真切地接近并且呈现出这个复杂和纠结的世界和时代,呈现出人性与生命内部的丰富景观。让我们记下这些句子——

一切都正在来临了
富有与贫困
孤独与快乐
在二十一世纪的圣诞前夜
——《圣诞前夜》

这极地的冰原让我心痛

这里从来没有过战争和屠杀
新丛林法则在此不适用
在没有人类的地方为何如此宁静
——《我带着伤感走在极地》

显然,和古代那些登临山水忧怀天下的诗人一样,登山带给了骆英一种深切的“哲学处境”,使他有站在这孤独的星球上思考人类生存与前途、思考其生存伦理的一种境地,这也正是他所说的“我终于可以远眺整个时代”的体验吧。但是与古代的诗人相比,骆英却不只是牵挂和忧虑着世界,而是时时会把灵魂解剖的利刃伸向自己:

在普塔的天空渐渐明亮的时刻
我看到我的四肢变成兽爪
——《我静静地观察我的四肢》

雪夜呢 依旧没有黑暗
这可使我不知所措
就像面对永远没有怨恨的爱人
我总感到自己有罪
——《雪夜》

天哪 山上山下的我是不同的种族
那种文明与野性的混杂
那种富有与苦难的结合
——《另一个世界》

假如说骆英的登山探险与诗歌中确乎包含了某种“现代性”特质与意蕴的话,那么应该是在这里。向外的追寻与感慨,始终伴随着向内的自省与叩问。这种对话产生的丰富的灵魂意蕴,使这场此岸与现世的登山,同时也成为了彼岸与精神世界的登山,变成了人性与灵魂世界的漫游,变成了一个“现代人”对生命伦理、对自身的反思。同时它还意味着,在这个正发生着迅猛巨变的时代,一个正日渐“深入世界”的中国人的思索,以及他背后一个古老而日渐成长的民族,他们的某种具有“心灵史”意义的精神记录与追索。

作为一种“速记式”和“口语体”的诗歌文本,《7+2登山日记》的风格无疑是浅近和“消费性”的,它并不刻意构筑语义的隐喻性与暗示性,甚至在某些局部它还刻意地掺入了粗砺的、甚至粗鄙的因素。假如我们从某种“纯诗”的角度去看待它,当然可以加以挑剔的,至少会认为它的内容和句子还可以锤炼和推敲。但转换一下角度看,这种刻意的粗疏与粗鄙也许又是有理由的,因为它确乎是在追求一种被叫做“整个时代”的庞杂性的景观和集合性的经验。假如字斟句酌、研精细磨,反倒会失去其某种“异质混合”的性质,会与这个消费性与“速食主义”时代拉开了距离。所以,其几乎不加深度设置的“一次性阅读”式的文本特征,也可以视为是一种“消费时代”的合理和智慧的处理,一种“后现代式的冒险”基础上的“后现代性的身体写作”。

不过,这种“身体性”的见证和在场的写作,不论其具有怎样特殊和巨大的“物质支撑”,它与传统的“中国写作”,与中国古代诗人们的那种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式的人生与写作方式,仍是一脉相承的。它仍旧会使我们相信,最终完成写作的不是纸和笔,而是在场的身体和生命实践。因此,当骆英说这些诗是“拿命换来的”时,我们应该向它致敬,因为它包含了身体力行的经验,包含了作者用“行动”来参与创造的努力。

它们证实着,“我就永远站在了我的极点”这样的说法,绝不是自夸。

修史立德不老情

□王必胜

两卷水史写纵横,
修史立德先贤心。
夙兴夜寐千百日,
草路蓝缕不老情。

这是读完上下两卷《中国治水史诗》后的即兴所占,翻阅这厚厚的两本有如《辞海》之巨的大书,油然想到的是这个“工程”的难度和编纂者们的苦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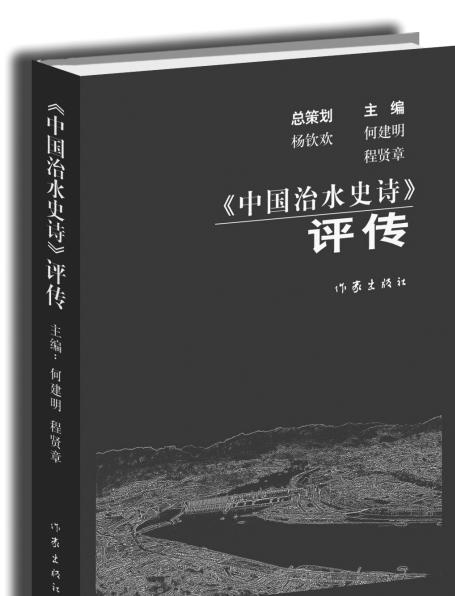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说,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为世上高人之品行。昔有司马迁老夫子为修史立言,忍受非人之苦,千古传颂。然而,当我们面对熙熙攘攘的当下、红尘滚滚的乱象,我们何有这种勇气和定力。文化的承传者,高僧大德者何在?

3年前,一个企业家和一位老作家,成为这样的文化有心人和苦行者。

这就有了我们面前这部颇具分量的大书、奇书。

面对这部书,使我想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清华大学讲过的一段话:“过去我们常讲水利是农业的命脉,现在水利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农业领域,还关系到经济安全、生态安全、国家安全,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。”由此,我们不得不钦佩企业家杨钦欢策划编写《中国治水史》的远见卓识。

面对这样一部两卷200多万言的《中国治水史诗》,评说它的分量,论及它的特点,难免用一两句话概括。且不说它对中国几大江河水系全方位、多角度的描绘和书写,也不说它纵横数千年、上下几万里的时空探寻、古今中的资料的搜集和征寻,单是它诸多作者的名头岂是了得?我们看到的是,一大批活跃在现今文坛,多是有点头衔的作家们的一次集体行为。他们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和领域,或整体,或片段,或一条水系,或几方跨地区的水域,或细部深入,或面上扫描,考据、论证、描摹、思



湖,或者,治理难度史上可堪记录的,作为重

点。全书分为黄淮卷、长江卷、珠江卷、海河卷、松江卷以及西部卷和东南卷等部分。其广

度与区域的展示,增加了书的分量。

我们还是从它的篇章开始探寻吧!开篇是

“黄淮卷”,也许编者的初衷是,作为炎黄子孙,黄河是母亲河,是中华民族先祖的摇篮,尊祖为先,由此开篇。在这辑中,几位作家都是重量级的,也多为时下创作力旺盛者,尤其是写散文、报告文学,他们是好手、快手。熊育群以散文的笔触,揭开了大禹治水的历程,以回望的方式,对这个史上最伟大最亲民的治水先驱者的精神、情怀、谋略进行了充分地文学书写。大禹的形象在千百年的历史流变中,款款地走来,历代历世,从统治者到庶民,从史传到口碑,褒奖有加,这是一个华夏民族圣洁者的形象。“大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水成功的人物,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治水英雄。”古代先民的神话,无论是治水的大禹,

还是填海的精卫,补天的女娲,以及神农氏,他们与自然的关系,是人类最早生命力的展示。可以说,人类社会的发展,最先的敌人也许是来自于水害,而与大自然的搏斗,变水害而为水利,则促进了人类的文明。在这些先贤们的奋斗中,折射了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。或者说,人类始祖,绵延至今,人与水,人与自然,永远是一对矛盾,有理不清的纠葛。

当然,在这些篇什中,不独有对于治水行为的歌颂,也对现实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清醒告诫。陈桂棣的《淮河的警告》,以“淮河流域的水污染已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了”,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,引人警醒。“淮河的警告”,实际上也是中国很多的水系在污染和断流的严峻形势下的警醒。黄河、淮河、海河、河套地区,还有黄海边的山东、引黄入晋的山西等,都开始注意水污染问题的严峻性。在冷梦的《中国梦幻》、雪漠的《石羊河与大凉州》、焦祖尧的《大河走高原》、刘兆林的《北疆水神》等篇中,从不同的角度书写了黄河水系、北方水系的治理过程中,仁人志士们如何巧用智慧,努力地变水害为水利的英勇业绩。同时表明,国计民生,发展的要务,合理地利用水资源,治水之后,长河安澜,民生便利。但是在环境日益恶化之后,人们赖以生存的水,应该如何珍惜和爱护,几大江河湖泊的现状,无不引起作者们的思考和警醒。黄土地上的治水之行为,见证了华夏民族治水之艰辛。“黄淮卷”中最明显的是,人类发展,漫长的治水历程,任重而道远,切实而严峻。

在“长江卷”中,有擅长全景扫描的何建明,以《百年梦想》为题,记录了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的历史。我们看到了,这条中国最大的江河,在其演变发展的历史中,与国计民生、国人福祉的紧密联系。为建造这样一个时代的工程,当代人上上下下,为之殚精竭虑,艰辛求索。为了造福于民,为了大江长河的不再被污染,为了南北水利的平衡发展,治水民生的重要问题引起了数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,这在人类史上极为鲜见。当然,这条闻名于世、中国最长的江河,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物体,不如说是一个见情见性、有格有体的生命。它流自高原,奔腾倾泻于平原,有如人体血管细流似的众多支脉,倾情于人口密集的富庶地区,孕育着无数灿烂的文明和优美的自然景观。读到这些生动地描写,从中不难体味到作者们的人文情怀,这是一部史书的另类诗情表达。当然,与本书主题相一致的是,从治理长江的岁月中,国人与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江,以及众多的江河湖海,形成了一个共生共存的关系。水的治理,或者水文化,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全方位多侧面的表现。

如果说,在“黄淮卷”我们读到的是历史,是先民奋斗的丰功伟绩,而“长江卷”以及后篇诸多文章,则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年来治水的坚韧与持久,也有历经磨难的民族精神不屈的表现。我们读到的是,对于这人类的伙伴——长江大河,其水利害,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,水的利用,人类期望于斯,也困扰于斯。其泽被于人,也祸害于人。所以,当编者从两大江河——长江、黄河,另外选择出来写珠江、海河、松辽、西部、东南各篇,我以为,不只是地域上的划分,也是从更为广阔的幅员上,对于中国水利事件的书写。君不见,水的保护和利用,在现时日益成为最迫切的问题,日益成为经济发展、民族进步,以至国家安全最突出的问题。编者从南北东西更为广远的层面上,展现这治水的广度与深度,既有关中的水文化多彩的一面,也有对紧迫的现实问题丰富集中的展示,足见其匠心。

从纯粹的治水角度看,作为一个经济的或社会的行为,有关部门重视,措施得当,投人得力,就会有成效,就会出典型、出经验,这无疑是一个现成的套路,也为现实所证明。但是,当这么丰富生动地展示一个民族长久的治水史,警示出紧要切实的现实问题,结集了蔚为壮观的文字,而且被认为填补了某种空白的时候,我们既有思想的收获,也让我们体味到一种别样的文化魅力:对于大自然的情感,对于家乡故园的情怀,对于天人精神的敬畏,对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忧患等。不同的文学感悟,种种现实追问,铸成了这本大书奇书的精神价值。

如果再简洁地概括,我认为强烈的史识意识、丰富的实证资料、多彩的文笔、各见匠心的文章构思,以及编纂者们的认真谋划、颇有气魄的印制投入,是这部书一面世就得到极大关注的原因。在此